

#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角色转变、知识体系与实践进路

翟万祥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扬州 225100)

**摘要:** 新闻传播学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后起学科, 在世界新闻传播学领域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探索, 逐渐脱离了西方新闻传播学的主导性影响。作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支撑学科, 中国新闻传播学必须建构其自主知识体系, 既要扎根本土实践, 又要沟通世界理论。同时, 在实践中回答新闻传播学的元问题, 从中国特色、传播体系、国际话语三个层面发展新闻传播学, 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 新闻传播学; 知识体系; 自主

## 1 引言

新闻传播学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 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作为一门注重实践的应用型学科, 在去西方中心化思潮下, 舶来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对于中国现象的解释力日渐式微,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亟待提上学术日程, 也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理论命题与实践课题。<sup>[1]</sup>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指出: “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 挖掘历史、把握当代, 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sup>[2]</sup>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生成与发展是世界新闻传播学历史的重要一环。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sup>[3]</sup>, 应从大历史的角度站来梳理新闻传播学发展历史, 解释其“为何”以及“如何”扎根中国本土, 解释中国现象, 总结中国理论。才能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视角入手, 既聚焦中国, 又关照世界, 在历史的积淀中探索学科知识体系建设的基准, 提高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系统的可行性。

## 2. 从“旁观者”到“局内人”的角色转变

新闻传播学是中国知识界的后起之秀, 它原本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 但新闻学的充足发展, 却形成了学科自身的。长久的西学依赖推动了知识的“原始积累”, 但“看似繁花似锦的背后, 敞露出研究的单一和原地踏步般的茫然”<sup>[4]</sup>, 导致中国新闻传播学亦步亦趋, 缺乏理论自觉和问题意识, 原创性的学科知识内容极为有限。直到上世纪末, 学界才开始建设真正扎根中国的新闻传播学, 重新审视中国新闻传播学如何能从“旁观者”转变成“局内人”, 寻找当下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时代路径。

### 2.1 启蒙中移植: 知识根植与路径依赖

虽然新闻实践在中国早已具有几千年的经验历程, 但系统性的传播学理论建构起步较晚, 整体而言, 早期中国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建构是西方知识谱系延伸的一环。近代以降, 西方新闻观念、媒介技术、职业机构给中国新闻业带来了一场春雨。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 1908 年建成后, 其享

---

**作者简介:** 翟万祥, 博士研究生在读,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史。

誉世界的“密苏里模式”，被移植到中国早期的新闻学教育和新闻业态实践中。<sup>[5]</sup>中国报业、广播、通讯迅速发展，出现了知识分子转型、政党办报等社会新气象。但中国新闻业在实践中快速发展的同时，真正研究社会场域中“传播”的学问还尚未发轫。

1919年杜威、帕克两位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在中国访问期间，将早期美国传播学的宣传效果、公众意见等传播学议题引入中国，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传播学的经验主义视角。但苦于多方因素，传播学在中国兴起于改革开放前后。其间半个世纪，中国传播学领域发展几乎是空白。这一方面是由于尚未放宽有对外交流学习之通道，使传播学尚未成为一种社会研究问题之学问；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社会制度决定了侧重发展新闻学。两相合并，致使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不平衡，也不能健全整体学科体系。而这一时期，几经范式变更后的美国传播学学科体系已成为西方争相效法的主流。

1971年，传播学政治经济学派达拉斯·思迈斯访华，在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做学术交流，给中国本土传播学革新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野。紧随其后的是，施拉姆携“大众传播”访华，正式拉开了美国大众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序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学者走出思想封闭指明了一条新路径。<sup>[6]</sup>也许是历史环境的缘由，达拉斯的到访并未激发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活力，反而是改革开放后的美国式传播学经验学派在中国的大行其道，却又导致中国新闻传播学逐渐陷入了另一个僵化的圈层。<sup>[7]</sup>整体而言，早期中国新闻传播学基本上形成了对西方学科的“路径依赖”。

## 2.2 自省中进取：辩证批判与身份焦虑

改革开放后，理论的旅行依然受制于情境化问题，“拿来主义”式的理论在碰壁后，就会激起主体的反身性批评。换言之，“没有任何理论能够涵盖、阻隔、预言它在其中可能有所裨益的一切情境。”<sup>[8]</sup>事实上，不论任何学科，不论何种学派，中国的学科体系建设仍然没有根本摆脱“理论殖民”。质言之，只发现理论而没有发明理论。全球化与后殖民时代，加速了知识的流通，却没有破除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话语殖民困境。因而，20世纪下半叶，萨义德认为西方想象与建构了“东方”，这非是对东方的客观研究，而是西方为自身利益创造的知识主导。<sup>[9]</sup>“东方主义”忽视了东方内部的主体性，也开起来东西方知识体系的话语对峙。

20世纪90年代，新闻传播学界的“李杜之争”在中国又一次重演，其核心问题是中国新闻传播学应该走那条路？一方面，学科内卷化导致被封为圭臬的经验主义在技术上越求精细，问题便分得越窄越细，抛弃了更大的人文关怀。<sup>[10]</sup>另一边，批判学派的兴发与经验主义产生了路劲分歧，也给导致中国新闻传播学边缘化的问题封闭、理论内衍、方法失衡等弊病带来了一剂良药。这一时间内，范式抉择激发了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反身性审思，即如何解决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身份焦虑”问题。因此，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建设必须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围绕“中国新闻传播是什么”来回答自身身份问题。

在西方新闻传播学引介中国不久，不少学者已经开始探索本土的学科范式。如早期孙旭培编撰的《华夏传播论》将中国历史的新闻传播实践与现有理论相结合，创造一门完全不同于西方传播学的本土路径。同时，国内马克思主义显学的迅速发展警醒着新闻传播学时刻保持批判思维和辩证立场，开辟属于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学术共同体。而国际上“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回应了中国本土应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冲击”产生的“拿来主义”症候。<sup>[11]</sup>沟口雄三提出“以中国为方法”，强调“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

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sup>[12]</sup>20世纪末，本土新闻传播学开始聚焦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文化环境等因素，开始创造了大量扎根中国传统传播现象以及当代中国情境的原生态、独创性理论成果，对突破西方思维束缚，超越西方理论霸权具有开拓性的建设意义。

### 2.3 祛魅中独立：观念脱钩与学科自立

西方新闻传播学作为理论霸权的一环常常饱受非议，21世纪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对外来理论观念的在地化实践与情景化审视，开始祛魅西方新闻传播学，使“自主”成为当下学科建设的主题。需要注意的是，“在地化”不是“狭隘”和“局限”。首先，中国新闻传播学仍然要与世界接轨，而不能完全脱钩。从新闻现象学来讲，“自主”是要转变中西的主客关系，在去西化过程中激发主体间性“互为主观”的交流对话功能，只有在多元意义网络中审视中国新闻传播学，统一特殊性和普遍性，增强学科自主自立的信心，走向国际，而不是只否定批判“他者”理论的偏差性。其次，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从上至下地构建学科“理论-实践”互动的自主框架。新闻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新闻观念决定了新闻媒介、新闻制度和新闻实践等现实要素。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而言，学科观念与其社会存在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又有其建构现实的独立性。<sup>[13]</sup>因此，要先发挥学科的主观能动性，自主调节自身知识体系，从而参与到学科的社会现实构造，再“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sup>[14]</sup>，达成学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在学科自立的基调中，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迎来了全面发展。一是，创新发散理论视角，自建学科范式体系。许多学者站在大历史思维高度，聚焦本土学科的“元问题”，跳出传统的“革命史”范式，<sup>[15]</sup>关照“新新闻史”“现代化”“媒介社会史”“阅读史”等研究视角，开拓了多元的研究体例、书写规格、思辨视角。二是，突破专业教育框架，以问题导向加强教育实践。随着媒介社会化深度演变，学科实践转向问题导向型，“数据新闻”“舆情监测”“四全媒体”等新兴新闻传播实践方向的开拓，推动建设新闻传播学应用型、复合型、全媒型人才培养模式。在学界与业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新闻传播学探索出了一些凸显“中国特色”的新范式、新方法、新实践。<sup>[16]</sup>

长期的旁观者角色使中国新闻传播学在踌躇良久后，更加清醒地审视学科建设的最佳路径。学科上层观念在去西化过程中，凸显中国特色，进而，重构学科其知识体系，以适应现实实践之需。

## 3 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三个基点

知识是人类认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经验总和，但囿于时间与空间限制，知识体系之间不尽相同，甚至相互抵触，那么知识体系的合法性便成为一种问题，其根本是认识与实践的矛盾。重建知识体系用库恩的话而言就是科学革命，即原来同一学术共同体遵循的范式标准和规则，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sup>[17]</sup>但建构新知识体系并非一蹴而就，对于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而言，要明确自身定位，设定自身目标，方能从中得到可行方案。

### 3.1 入乎其内，出乎其中：辩证对待知识取舍的边界

知识的流通是人文社会科学普遍的跨文化现象，全球化进程中知识的创新与扩散难以避免，知识的地域身份、文化背景也愈加模糊。作为一个知识输出输入大国，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伴随着

全球知识网络的演变。学科与学科、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知识总是处于你来我往、相互交融的状态，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并非是在中国与“他者”中划出一个明确的分界线，这是种极端“自主”会导致理论的贫瘠。此外，在破除僵化的知识边界的同时，也要接受不同文化语境、时空坐标的检验与辩证，提升自身理论解释力包容性，在中国实践中发现其全球适用性。只有消除学科内心中的狭隘与自傲心理，深入其他知识网络中交流借鉴、多元互动，才能甄别优缺、相互补益，实现真正的平等对话和理论超越，将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成辩证的有机体。

此外，“建构”也并非完全的“重构”。重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以“解构”为前提，也就是说以“解构”为手段，以“重构”为目的，但忽略了知识体系结构转换过程中意义互动的重要性。只有建构知识交流的互动空间，关照中国问题和现有知识体系的互动效果，才能深入探寻微观视角下的知识与人文社科相互影响因素，从而针砭时弊，去粗取精。也就是说，建构知识体系不仅仅意味着二元对立框架下的去西方化，也不是为了创新而重构糅合。建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深入知识社会场域互动，才能在多元互构中发现那些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和包涵普遍意义的知识单元。总体而言，要建立自主且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深入把握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主动把握历史进程，汲取其他知识群体之优点，补益自身知识体系建设之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丰富知识体系的多元意义网络，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中的效果。

### 3.2 以小见大，联通整体：扎根哲学社会科学网络的中心

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借鉴、平衡和协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推动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闻传播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后辈”，其跨学科的生成背景决定了新闻传播学是哲学社科的十字路口，是多学科交叉汇入的中心。<sup>[18]</sup>新闻传播学吸纳了大量的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精华，形成了自身多元异构的知识体系。同时，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与哲学社会中其他知识集群相辅相成，相互补益。正因此，新闻传播学才成为许多交叉学科的支撑学科，构成自身“内恋”与“外依”的特点。但建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强调建立学科知识壁垒，因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先天性薄弱决定其对外的依赖性，但也不能过度依附其他学科，否则后天的失调导致其沦为哲学社科的一片知识“孤岛”。

正如詹姆士·凯利所说，“新闻学应该植根于人文社会科学之中，它与政治联系，从而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与文学联系，从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与哲学联系，从而确立自己的道德基准；与艺术联系，从而捕捉完整的视觉世界；与历史联系，从而建构自己的意识和直觉。”<sup>[19]</sup>新闻传播的多元互构知识体系要弱化差异性，增强自身通约性，但要以保证学科开放性为前提，结合诸多学科优势，建立一套自己的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马克思主义为共同交流话语，强化新闻传播学的红色基因，将新闻传播学建成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交流平台，成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可再生产知识资源中心。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内恋”与“外依”失调，承担学科知识交流中心的角色，保证新闻传播学“跨文化”特性，使其既有专业性特色，又有共通性内容。

### 3.3 多元互动，沟通世界：构建世界多元知识网络

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要锚定“以中国为根本，以世界为面向”的基调，秉持开放、交流、创新、共进的态度，妥善处理自主知识体系与世界知识网络的关系。一方面，就扎根中国问题，分享中国智慧而言，必须加强传播人类新闻传播世界中的共通性、基础性、前沿性理论问题的原创性成果。实现从一般性国际交流到知识共创，增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使中国经验的优秀成果和有益经验惠及各个国家地区。自中国国际新闻工作巧妙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世界人民发现了中国处理国际公共关系的张力逐渐超越了西方治理瓶颈，在通过参与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共同体建设、缓和中东关系等国际事务，不断推动国际舆论格局去中心化，彰显了中国媒体在在解决全球问题挑战、引领世界建设发展方面的独特价值。因此，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在实践中提高对于不同地缘政治的“他者”的认同性，更好地落实“走出去”战略。

另一方面，就推动世界知识格局转变而论，正视“西强东弱”现有学术格局的同时，把握“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某得自身知识话语的一席之地。当前全球知识网络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仍占据制度性优势地位，但面对“他者”话语权崛起，更倾向采取回避策略。央广网曾报道欧洲学者扬·奥伯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曾通过立法出资 15 亿美元培训西方记者撰写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sup>[20]</sup>由此看来，美西方国家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近乎成为寻求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陷阱。反观中国走出了一条兼具“世界观照”与“本土关怀”的发展之路，在双向互动与平等交流中，积极推动全球知识网络去中心化，以知识格局的多元转变推动世界格局发展，使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在与世界的融通中相互促进、互利共赢。

#### 4 从“元问题”创新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实践进路

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新闻传播实践活动密不可分，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新闻传播业态实践亦是相辅相成。当前，学界对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已有了初步的理论框架，但在实践中还没有能力完全回应新闻传播学的“元问题”——新闻传播作为一种以体系化的信息传播为取向的实践活动，如何通过影响人的个体发展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构建，促进人与社会的良性发展以及信息传播体系自身的进化。<sup>[21]</sup>因此，必须在实践进路中回答“元问题”的两个维度：对内，信息传播体系自身的建设；对外，这一体系及其实践活动的外部影响，更好地推动上学科层理论建设。只有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拥有的独特性纳入实践范畴，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才能回答时代命题。

##### 4.1 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特色

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中国特色”内涵在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使命，彰显出具有开放交流、科学规范、多元自主的时代特征。为服务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23 届中国记者节上发言并强调，“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sup>[22]</sup>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把新闻传播工作同中国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紧密结合，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发挥“中国特色”的优势。面对新冠疫情、自然灾害等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央全面加强公共事件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指挥，提出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的总要求，主流党媒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主动参与重大社会议题设置，积极引导两个舆论场沟通互动，快速有力传递权威信息，及时制止谣言散播。坚定弘扬、展现、凝聚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同时，向全球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让中国方案作为全球秩序裂痕的弥合者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者。

#### 4.2 打造全国性媒体融合“一盘棋”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sup>[23]</sup>不同技术的出现改变了旧有的社会面貌，当下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出现了新趋势新变化，乃至当下的新闻业呈现一种“技术主导新闻律”。<sup>[24]</sup>媒体融合是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实践中必须攻克的难题，也是检验新闻传播学理论的试验场。纵观媒体融合发展的十年，媒体功能、效益和价值不断提升。各大媒体将“媒体融合”概念置换为“融媒体”“主流媒体”“新媒体中心”，推出“中央厨房”“全媒报道平台”“前网后台”“三微一端媒体矩阵”等各式各样的融合、转型探索实践，初步实现了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融合发展。<sup>[25]</sup>要持续打好媒体融合这张牌，在传播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上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舆论中心精准投放，让宏观意识形态以“皮下注射”的方式直击微观个体。只有将媒介技术作为当前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建设的突破口，优化媒体结构，整合媒介资源，构筑线上线下一手抓的“一盘棋”媒介格局，打造媒介平台的中国实践范本，在知识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

#### 4.3 创新国际话语修辞表达

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是中国外争话语权的重要路径，只有加强对外传播手段和创新国际话语修辞，才能让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达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效果。但上世纪末以来，由于中国国际地位与国家综合实力不匹配，面对政治牵制、舆论抗争等问题，新闻传播实践未能深入国际格局，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存在较大“逆差”，常常处于缄默状态。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开创了“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原创性科学性的新话语、新概念、新表达。在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下，中国秉承协商对话、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原则，既聚焦中国实践，又关照世界问题，创新国际话语修辞体系，提升中国方案号召力，带动亚非拉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治理，推动国际舆论主体多元互动交流。凝聚世界各国的价值共识和行动共识，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结交、团结和争取大多数国家，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在实践中彰显学科发展的理论价值，“润物细无声”地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认同感。

### 5 结 论

新闻传播是现实社会场域互动产生的现象，因而现实学科的生成十分注重空间因素。一是要聚焦自身所在空间单元中知识的独立生产与实践，二是要强调多元空间中交流借鉴所互构的知识信息。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要思维逻辑转变到“中国”，以从中国问题和方法出发作为基石，而且要揭橥自身的世界性，把观点拓展到国际市场。这样学科的“自主”才能既不囿于自身的“内恋”性，只强调地方性知识的特殊性价值，又不盲目地否定“外依”特点，进而关注全球学科知识的普遍性张力。多维学科的

景观本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不同角度看待新闻传播学，就能够发现其自身的多样性、跨学科的多元性，既要看到“岭”和“峰”差异化问题和优势，也要汲取价值“高低”不同的知识体系的优秀成果。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有了“能见度”，在跻身世界学科之林时对推动现实世界知识格局转变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仍需要在实践中走出一条行稳致远的中国特色路径来提高学科的认可度，使自身在学术格局中保持独特的价值。

## 参考文献:

- [1] 赵静,张涛甫.中国式现代化与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J].现代出版,2024,(05):21-31.
- [2]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226.
- [3] 李潇潇.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涵解析[N].经济导报,2025-04-18(04)
- [4] 黄旦.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2(12):5-19.
- [5] Yong Z.Volz, Chin-Chuan Lee.American pragmatism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importing the Missouri model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to modern China[J].Media,Culture & Society,2009,31(05):711-730.
- [6] 任洪涛.论施拉姆访华与中国大众传播思潮之泛起——基于反思视角下的拓展性分析[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6(01):58-63.
- [7] 胡钰,虞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国际新闻界,2016,38(08):92-115.
- [8]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M].李自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422.
- [9] Edward W.Said.Orientalism[M].London:Penguin Classics,2003.
- [10] 李金铨.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92.
- [11] 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 [12]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M].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30-132.
- [13] Peter L.Berger,Thomas Luckman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M].London:Penguin Group,1966:19-29.
- [14] 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2.
- [15] 余玉.新闻史研究的范式转型和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创新——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润泽教授[J].传媒观察,2022(10):38-43.
- [16] 邓绍根,强若琳,刘欣欣.夯基·开拓·创新:新时代10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J].传媒观察,2023(04):59-69.
- [17]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
- [18] Schramm.W.Comments on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59,23(01):6-9.
- [19] W.Carey J,李昕.新闻教育错在哪里[J].国际新闻界,2002(03):8-11.
- [20] 央广网.欧洲学者:美国花15亿培训记者撰写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EB/OL].[https://news.cnr.cn/native/gd/20231219/t20231219\\_526527473.shtml](https://news.cnr.cn/native/gd/20231219/t20231219_526527473.shtml)
- [21] 周勇.从元问题出发: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进路[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29(10):5-13.
- [22] 人民网.习近平: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1108/c1001-32561406.html>
- [23] 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 [24] 杨保军.论作为宏观新闻规律的“技术主导律”[J].国际新闻界,2019(08):108-134.
- [25] 郑保卫,郑权.习近平媒体融合发展重要论述的发展逻辑与实现路径[J].传媒观察,2024(06):5-14.

#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Knowledge System,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Zhai Wanxiang*

(College of Society Science, China University of Yangzhou (YANGZHOU), Yangzhou Jiangsu 225100, China)

**Abstract:**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is a relatively emerging discipline with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fter nearly half a century of exploration in the global fiel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t has gradually moved beyond the dominant influence of Western paradigms. As a supporting discipline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must construct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that both roots in local practices and connects with global theories. At the same time, it needs to address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the discipline in practice, developing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thereby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knowledge system; autonomous